

当代

洁民

文学

的

当代文学的社会——
历史批评

社会

历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批评

责任编辑：杨国良 松 涛

封面设计：柳 泉

当代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

Dangdai Wenxue De Shehui——Lishi Pip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7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8}$ 插页2

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

ISBN 7-02-001270-1/I·1171 定价4.40元

前 言

近几年文学观念的迅捷变异，使得原来的评论格局不甚适时起来，相较之下，单一的社会和历史的分析，并不能全部揭示出文学本体的内在价值来。平心而论，这个变化是合理的，这就使得写评论的人，非去重新思考不可，也非去敲开心理学、语言学、思想史等等学科之门不可，否则很难摆脱单一研究的窠臼，自然也就很难把评论写得深厚和丰满起来。面临这个局面，唯一的出路也只能是不断地学习。

倘若说，只以社会的和历史的观点去分析研究当前变幻万状的文学创作，是远远不够了，这是对的；但有人说这已经不行了，因为文学观念已在变革，那个老观念已过时，这说法就不对。对文学可以有多种视角的评论，运用多种学科的联系去综合研究，但是却不能取消社会的和历史的分析这一重要的批评方法，或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评论文学的重要方法。道理也非常简单，不管文学创作要表现的生活内容如何多端，哪怕是人的内心的流动，梦幻的飞驰，总不过是一种人间的活动，而且也总得带上社会的印记。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这总是无法否定的。要评论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完全舍弃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那岂非是笑话？作家在作品中要表现的某一心态，总是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完全失却了思想评价的文学评论，我以为便是失却了理论批评的

主心骨。

在这里我深为目前出现的不少出色的评论家感到钦佩，他们的成就，已标志着当前评论的质量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同时也为从事于这一工作的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当前评论的批评方法是多样性的和多视角的，一些新的成就非常值得重视，正因为视角不同和方法不一，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模式，评论和创作一样的需要创造性。因文学观念的有异，因此评论的视角和方法就不一样，然而它们又各自显示着自身的价值。因之鼓励这种视角不同的立论应该共存的意见是合理的，任何理论倘只有一种见解或一种模式，理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文学评论的多样性和多视角的发展中，我就觉得社会的和历史的批评方法并没有过时，倘有学派可归，那末社会学派评论便可以算作一家。“过时”论者认为这是不行的事，但它的能否长存，历史会去作出决断的。

我写的文字大体也是这一类，只觉得没有写好，要真正的写好还很难。倘若还能写作，我还是按这个路子写下去。这两年多来所写的结成一集，算是在寥廓的空谷中一点微弱的呼喊，至于有无一丝回声，则远不是我所要企求的。

作 者

1986年11月

BF85 107

目 录

前言·····	1
---------	---

上 编

历史感：文学对时代的渗透·····	3
蜕变中的文学：评当代意识与寻根意识·····	10
走向社会：新时期文学七年随想录·····	15
文学现实和文学理想·····	23
文学与现时代：札记五则·····	31
批评与反批评：文学自由随想·····	46
文学批评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56
从现代文学看当代文学的两点思考·····	62
复杂性格问题散论·····	68
报告文学杂谈·····	75
在沉思中探索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导言·····	83

下 编

被撕裂的历史悲剧：关于《绿化树》·····	101
平凡中见奇异：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111
民族文化心理之追寻：《小鲍庄》散论·····	118

历史颤动中的心灵变异：关于《河魂》·····	128
复仇主题的历史内涵：论《冬天里的春天》·····	133
《山村》小论·····	150
小说人物散记·····	155
社会学与文学的溶合：周克芹创作散论·····	174
艾芜论·····	190
农村的新足音：《农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序·····	213
激情充盈：读一九八三年部分短篇小说·····	220
一九八四年文学艺术简评·····	231
思想的云彩：读荒煤文学评论集《回顾与探索》·····	237
要有新型的批评风度：兼谈李子云评论集 《净化人的心灵》·····	243

附录

我的写作旅程·····	248
-------------	-----

上 编

历史感：文学对时代的渗透

当前文学创作中审美意识的觉醒，使文学的素质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内中对民族文化心理的寻求和开掘，已经涌现出了一簇瑰美的文学云层。然而在众多作品中纷呈的美学追求也不尽一样，有的一意沉醉于古朴，有的着眼于寻求悲凉的主题，有的集注于民俗风情画的描绘，或夹杂进一段传奇性故事，也有的在辛勤开掘之余，与现代意识以至时代感有所融合。这一探索的趋向正在发展，不能要求每一篇作品都是成功的，但是几乎每一篇作品都各有着独异的新意，共同之点是对深沉的民族灵魂的重新审视，历史地、真实地给以解剖性的呈现。

上溯得略为早一点，例如在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进城》，锦云、王毅的《笨人王老大》，何士光的《种包谷的老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作品，已蕴蓄着深厚的传统气质，那种古老、淳朴、善良的心灵，如同石窟中原始文化的壁画的雕刻，闪着斑驳多姿的光辉，如此的难以磨灭。

不过近几年中文学创作的开掘是更为深广了。倘要寻找其差异的地方，那末先前几年的作品，是在闪现那种精神气质的珍贵的片刻，如同一幅浩繁的画卷，只是展出了内中某一动人的片断一样；而近来的创作，则是伸展到更为深沉的层次和进入到整体性的开拓了。这是一。其次，前述的一些作品，大致着重于某一人物的个别性格的描绘，而现在小说中出现的，除

了也保持这一特色外，又常常着力于描绘群体，作品所触及的，是渲染着一群具有不同的个性又有着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画卷。

最不易磨灭的感受，是那些作品所蕴蓄的深沉的历史感。我以为，历史感应该包容着层次较为复杂的哲学内容和文学内容。第一，我们从那些作品中所获得的在民族土壤中生发起来的民族文化素质与民族感情，包括有独特色彩的民俗风情，给我们构筑着一种历史的真实感的审美感受。使我们感到是动人的、真切的、是我们民族的。第二，这历史感表明着历史向现实的伸展，民族传统素质向今天的延续。国民性的内涵其实也正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它不是从天而降，是历史的社会文化心理发展进程所形成的，它也不会因时代的变异而立即断裂或丧失尽净。我们尽管生活在同古老时期不相干的新的社会环境里，但是我们的若干观念和某些文化心理却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地在我们身心中存留着，存留的民族素质中包括着优质和劣质，在那些文学作品中我们所猎取到的文化素质所以感到真切和动人，只是因为我们是如此的熟悉它。第三，强调此种历史感，还因为是民族传统素质中那些优异的因素，以至是崇高的因素，是久远地影响着历来以及今天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的滋长发育。这些因素包容着民族的淳朴、善良、自强不息、舍己为人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在那些作品中所感受到这种种因素的发扬，有现实的原因，但是不可忽视地觉察到那种历史的继承性的精神力量。第四，历史感中还包含着另一层重要的意思，就是民族传统素质中为我们带来的某种牵累的因素，也就是所谓民族文化中的某些沉淀，诸如惰性、墨守成规、顺从、安天乐命、为长期文化低下造成的愚昧等等，它又和千百

年来的儒家思想和封建意识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顽强的习惯力量和历史进步的阻力。恩格斯说过，“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①，指的正是传统中的负量因素。我们在那些作品中几乎随处可以见到那种精神沉淀物的映现。自然，作品的揭示固然也是开掘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决不是欣赏它，决不是为它而发起“思古之幽情”来，而是揭示它的习惯力量和顽强性，经过艺术思考去改造我们的民族灵魂。

历史感的渗透，为那些作品带来了特异的活力。例如王安忆的《小鲍庄》，就充塞着浑厚的历史感。小鲍庄这个村落，一直保持着一种静止的状态，自然经济的网络，像蜘蛛网一样把它吸纳在贫困的静态里。那静态几乎板结为一种凝固体，小鲍庄纵有一番动静，有逃荒来的，有发疯的，还有洪水的灾害，但是那村落的空气却一直是凝固的。那凝固中包容着人们善良的心灵，古朴的情意，然而这淡淡的烟霭弥漫于那种孤凄与悲凉的大漠之中。这一艺术构筑所掩映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沉的苍凉感，然而作者却从贫困所锤炼起来的民族感情中寻求着美好的气质，这就可见之于拾来、二婶、小翠子等形象中，尤其是涝渣的舍己精神，是全篇中表现美好的民族心态中的一个顶点。这种美好的民族心态，还可以从李杭育的“葛川江文化”系列小说中见到，我总觉得他的作品中还是《最后一个渔佬》写得最好，福奎的心灵几乎是刚中有柔的，他的安贫乐道是一种久远的民族心理，他在爱情上的挫折而表现出的执着与豁达，既钟情又为对方设想而放得开，就是他气质中刚中有柔和安贫乐道糅杂起来的心理状态的折射。然而这种美好的心态是何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66页。

可爱，于世俗者看来这也许是可笑的，他的不屑于势利见识可能被看作是孱头，听任心爱的人去嫁人也可以被人认作是示弱，但是福奎的心灵与此却毫不相干，他的执着与豁达，映现着民族情感中的情义和正义的意绪，这正是作家所要显示和追求的。

民族文化心理的较高层次的因素，在郑义的小说《老井》中是被深化了的。有一点和《小鲍庄》相似，它写了古朴淳厚的民族情感的人物不止一个，而是一个群体，如孙石匠、孙万水、孙万山等等；但它与《小鲍庄》极不相似的一点，是《小鲍庄》的氛围是一种凝固体的静止的状态，而《老井》却是如河流东去般的活动的状态。小说中的孙旺泉、赵巧英，他们的血液中固然存留着祖先的气质，如孙旺泉对挖井寻水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另一方面婚姻上与段喜凤的结合却又是屈服于祖父意志的顺从的心态，但是在孙旺泉和赵巧英的精神世界中，渗入得更多的是时移世易后的现代意识。他们的爱情关系在那种封建的世俗意识影响下是不可能成立的，而现代意识的觉醒使他们不至于成为一场无可解救的悲剧。赵巧英的最后出走，表示出一种反抗精神，去寻求自己的生活道路去了，这就显示出今天的山村中冉升起一缕令人苏醒起来的轻烟，人们的心灵正在活动中变化着，赵巧英对陈旧的传统观念和习俗的突破，是在沉闷的山村的天空中响起一阵长鸣，这长鸣具有醒眼的时代感，那就是山村在变，生活在变，人的观念在变，深沉的民族文化心理也在变。

小说的这一深化，使得文学寻求民族文化心理的踪迹，获得了可靠的落脚点，使得这一追求为现实生活的发展开拓着一条通道。归根结蒂，文学总是要同发展中的现实生活的抒写联结起来的，民族的传统因素也总是要在现实的发展中既被继承

又是逐渐地起着变化的。狄更斯曾剖析过美国的民族性格，认为除了爽直、好客和勇敢以外，还有爱好热闹、追求刺激、浮夸、自我吹嘘等等特性，这些特性在今天的美国民族性中也在流传着，但已经不止是这些，善于深思和冒险精神等等似乎可以看作是新的补充。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与贝娄或麦卡勒斯作品中的美国民族气质相较，自不可同日而语。无须多说，完全拘泥于旧日的民族文化心理，势必将忽视发展了的现实生活。

当前的长篇小说中，孙健忠的《醉乡》和矫健的《河魂》，描摹的风物人情，也饱含着丰满的民俗色彩。前者通篇涂抹着土家民族的风情，后者则倾情诉说着水乡的传奇故事。在它们表现的古老而深沉的民族气质中，相同的一点，两个作品的文学起点都从往日的衰败驰向跳动着的生气勃勃的现实世界。《醉乡》中的矮子贵二，《河魂》里面的小磕巴，负荷着民族古老的历史重负，在时移世易中接受着新的洗礼，恰如阿Q从土谷祠中走出来投身到革命中去一样，身心和灵魂中充塞着新旧杂色，构成了多年来文学作品中所罕见的新型的农民特性。不论是矮子贵二或小磕巴，在他们气质中的诚笃、善良等本性是不会移去的，正如他们的脚跟不能也不会离开生食于斯的那块土地一样，然而他们在世风的沐浴中领受着崭新的现代意识，要看到在这样的新型农民的心田中，他们不止是只会一般的算计，他们有着非比寻常的经营头脑。矮子贵二独立经营油坊、粉坊，小磕巴矢志于本乡中石墨的开采。现代意识的输入，不仅改变着那些穷乡僻壤的经济面目，也在增长着如矮子贵二或小磕巴的气质性格和文化心理上的新因素。那种由自然经济网络所形成的单向性格，诸如诚笃、木讷等因素，为生活浪潮的撞击而逐渐被磨损，由此生发起他们性格因素中的机警、精明和某种状态的狡黠等

素质来。这两部小说中出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描绘，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古老的板结状态，而是融合着现实进展的新鲜状态。

刘心武的《钟鼓楼》可说是很有现实感的了。其中有几个人物像薛大娘、海老太太、荀兴旺师傅等等，都蒙上一层令人亲切的古老北京市民气质的纱幕，几乎很难判明他们和她们生活在今天的时代。要说历史感，从这些人物的活动状态中可以看到至少一个世纪以来北京市民的历史疤痕，到如今仍滞留在生活里，连澹台智珠也守持着旧艺人固有的生活准则。自然，小说中也写了脱尽此种气质的现代人，例如荀磊、海西宾、张奇林等辈，全盘寻找现代生活方式的慕樱女士更不必说。小说如一球锦簇花团，集古旧的民族情致和现代人的感情方式于一体，体现出了生动无比的当前北京人的生活场景的一角，有历史感，有立体感，更有现实感，无疑这是一部好作品。然而，到底仿佛还缺少了一些什么。我想，《钟鼓楼》群体中涌现的纵横交叉的新旧意识，还缺少一点时代意识的流向感，不管他们要追求的是是什么，大体都停留在生活的平面上，在人们的情感活动中还看不到深度的生活节奏，具有时代感的节奏。恩格斯在要求文学具有“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同时，提出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一重大命题，《钟鼓楼》对前者可说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但是在后者，却未免过于薄弱了。

我以为，历史感和时代感的融合，是当前文学创作中可以探讨的一个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是个庞然大物的意识组合，作家去寻求的刻苦精神是可感的，但是在寻求中有所抉择和有所抑扬，却是应该意识到的。民族情感有着深固的传统力量，然而它随着历史和现实的变迁也在不断地有所流变，

看到这种流变是一方面，看到民族气质中生发着一种新的情感形态，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所生发起来的，这是又一方面。两者的融合在我们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新形态，似乎很值得作家的探求。

有的作品在寻找古老的民族心理时，好像花尽了力气，但是作品的心追手摹，只是停滞于那些本来面目上，说得透底一些，有的实在是对民族古老性格的种种临摹而已。我们并不赞成对现实生活作直接传播的那种平面式的反映，对民族文化传统素质的开掘，采取那种平面式的写照，似乎也并不可取。鲁迅对古代艺术的采取，曾认为“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溶化于新作品中”。这讲的虽然是对古代艺术，但是意思用于此处，倒是相通的。

溶化于新作品，我以为也不在于贯串着一段传奇性的故事，就算是上乘之作。传奇性倘只是为了寻一点新奇，猎取为某些读者所喜爱的异趣，那也不过是文学的俯就之意，并不会真正的生命力。

至于这种开掘在艺术方法上的新追求，倒是很值得注意的。例如郑万隆、韩少功等作家，他们在传达民族的传统感情中，颇致力于运用着外来艺术经验的结合，有浓烈的色彩感、跳动感和朦胧感，就表现方法说，是很有艺术工力的，与希求表现的情事，融合得也颇为恰当。所抒写的情感，大抵则注重于空旷悲凉的意境，倘有所开阔与进展，那倒是人们所希望的。

（原载《文艺报》1986年1月4日）

蜕变中的文学：评当代意识 与寻根意识

生命的运动有变化转换的时节。蚕吐丝结茧为蛹，蛹破茧而为蛾；水至冰点为固体；春发萌芽而为花朵。文学虽不是自然界的物体，但文学的生命一样是运动不息的。有人为此种不息的生态怀有忧虑，面对新异的内容，为之怵目的文体样式的五光十色，纷至沓来，总觉得离原有的文学面目似乎远了些。然而，从文学总体的发展趋向看，这是一种杞忧。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变化中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转换的轨迹，原来人们熟悉的形态，随着时光的推移逐渐地瞠乎其后了。这不是什么可以悲哀的事，而是文学的生机，生机的萌发是一种蜕变，一种转换，转换中还不免会带来一点阵痛。

社会意识的不断变化组成为现代人的种种性格，在文学创作中就为人们所日益关注的所谓当代性或当代意识。可以认为，当代意识就是崭新的时代意识，它是在现代化和改革形势中日益发展和完善着的意识，它将冲破一切保守封闭型的任何观念，它将触动人们早已习惯了的某些大抵过时了的行为规则，但是它又将为那种貌似公正，实际上为维护应被生活所否定的某些旧传统所横加阻挠，当代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原是极不平静的。

要在一个文学作品中看到当代意识的完整的形态是困难的，因为它宛如覆盖于地球的大气层，北飞而如巨风，南流则

成阵雨，西驰如云，东行乃晴朗一片。一个变幻万状所组合的巨大的宇宙物体，是很难用一个色调来描绘的。然而描出它的一肢一节，写出它的某一神髓，则又为文学创作所能。目前人们谈论着小说《阴错阳差》(蒋子龙)，且不说它的主题所在或艺术构筑如何，只说其中的人物布天隼，乃是一个当代意识型的。她的受挫和被排斥是意料中事，但是在人们心目里，她在生活中的位置却是无法摇撼的。她的处事认真，她的严格的治学精神，她的特异的研究才能，她面向世界的远见，足证是个真格儿的当代人品格。小说《新星》(柯云路)中的李向南，就总体说，这个人物过于理想化了，很难从生活中找到一个入世未久的青年有如此干练的政治才能。尽管如此，作者却是从现实生活中猎取了众多的精神元素，搜集于李向南一身，造成了他的当代意识性格。原来被人们视作“正确路线”化身的顾荣、郑达理等人物，在当代性人物的对比和映照下，就显得那样的庸俗和令人厌弃。

也有人把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也列入到当代意识的范畴中。仿佛凡是当代青年人所有的特殊气质，例如倔强、有时颓唐，生活方式散乱等才足以称之为当代意识。其实当代意识并不在于人物表层的个性特征，任何人都会有不同的个性，重要的是在探求具有当代意识的人物内在的精神结构是什么。这内心的精神在不同的层次中表现着时代的流向，它有时是直线的，有时是曲折的，有时明朗，有时隐晦。例如布天隼、李向南，大抵是直线和明朗的，《无主题变奏》中的主人公，看来是曲折隐晦地表现的。有人因为这主人公的孤傲、倔强、颓唐、生活方式散漫而大摇其头，认为这些与当代意识无关。其实这不过抓住了一些性格特点，远未触及到他的主要精神元